

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系列丛书

环嵩山地区史前聚落分布  
时空模式及其形成机制

鲁鹏 著

科学出版社



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系列丛书

# 环嵩山地区史前聚落分布 时空模式及其形成机制

鲁 鹏 著

科 学 出 版 社

北 京

## 内 容 简 介

本书在地理学人地关系理论支持下,利用多种空间信息技术,通过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对环嵩山地区早期(9000aB.P.—3000aB.P.)聚落空间分布的规模—等级、传承模式、文化交流、总体形态的具体特征与演化模式进行细致分析,以此对区域早期聚落空间分布的总体特征及其演化进行归纳与总结。继而,通过对区域气候、地貌、水文、植被以及生业模式等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探讨了上述要素与区域早期聚落分布时空模式之间的相互关系,试图以此对区域早期聚落分布时空模式形成的作用机制进行阐释。

本书可供地理学、考古学、环境考古学、第四纪地质学、空间信息科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学者和高校相关专业师生参阅。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环嵩山地区史前聚落分布时空模式及其形成机制 / 鲁鹏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7.8

(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系列丛书)

ISBN 978-7-03-054119-2

I. ①环… II. ①鲁… III. ①嵩山—聚落环境—石器时代考古—研究 IV. ①K87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92477号

责任编辑: 郝莎莎 / 责任校对: 邹慧卿

责任印制: 肖 兴 / 封面设计: 北京美光设计制版有限公司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7年8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7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1

字数: 260 000

定价: 10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 “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系列丛书”

## 学术顾问

李学勤 严文明 许顺湛 朱绍侯

## 编纂委员会

主任：刘其文

副主任：王文超 李柏拴 丁世显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万令	王宇信	刘庆柱	朱士光
朱凤瀚	齐岸青	李 民	张文军
张文彬	张民服	张立兴	陈 英
罗哲文	赵德润	徐立德	徐光春
贾常先	郭 旃	高 星	寇玉海
阎铁成			

# “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系列丛书”

## 编辑委员会

主 编：李伯谦

副主编：杨焕成 郝本性 阎铁成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 巍	王文华	任 伟	孙英民
孙新民	宋豫秦	张松林	张国硕
陈星灿	周昆叔	郑杰祥	赵富海
顾万发	郭黛姮	程民生	

## 《环嵩山地区史前聚落分布时空模式 及其形成机制》

作 者：鲁 鹏

# 前 言

聚落是指人们聚居之所。从字面意思来讲，“聚”“落”二字皆有村落、居住地之意。《史记·五帝本纪》载：“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兵车行》中也有“千村万落生荆杞”的描述。同时，“聚”与“落”又都具有持续一定时间的稳定状态的涵义。人们在特定地点栖息活动至一定时间方可谓之聚落。人类从游猎转为聚居，必然会对长期居留场所的位置进行考虑和选择。久而久之，聚落的空间分布会体现出一定的规律性。而且，这种规律性并非一成不变，其总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转化与改变，表现出一定的演化性特征。这种聚落分布规律的演化性特征可称为时空模式。

聚落分布的时空模式被考古学、地理学、环境考古学等相关学科所关注，但各个学科的研究重点与目标有所不同。考古学中的聚落分布时空模式研究称之为聚落形态，其更多的类似一种用以指导考古调查、发掘与资料收集、整理、分析的技术方法体系，目的是通过聚落形态研究揭示早期人类社会的运行状态与演进历程。地理学更多的关注现代聚落分布空间特征，目的是通过聚落空间分布及其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研究揭示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以此为未来聚落的合理布局与发展趋势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借鉴。环境考古学某种程度上是考古学与地理学的结合体，其将考古学的数据库与地理学的理论方法优势有机整合，通过早期聚落分布时空模式研究探索聚落分布的空间规则及其演化特征，以及隐含在其中的内在机制，用以阐释早期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及其演化特征。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早期聚落分布时空模式研究，环境考古的两大研究内容，古环境研究与古文化研究被有机结合，使得古人地关系研究在早期聚落分布时空模式的框架下显现出前所未有的直观与可操作性。

环嵩山地区是指以嵩山为核心的郑州、洛阳、许昌、平顶山及其周边地区。这里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点地区，拥有绵延数千年不曾中断的文明演进历史。区域早期（9000aB.P.—3000aB.P.）聚落分布众多，类型丰富，是开展早期聚落分布时空模式研究的理想区域。同时，由于环嵩山地区在华夏文明起源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在这一地区进行早期聚落分布时空模式研究显示出与其他区域不同的独特作用与意义。通过

环嵩山地区早期聚落分布时空模式及其形成机制研究，区域早期聚落的分布特征、演化规律及其与人类文化、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将逐渐明晰。以此为基础能够继续开展区域社会复杂化历程、人地关系系统演化等更为深入的相关研究，对于中华文明探源、早期国家形成与发展、人地关系相互作用机制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与意义。

本书是作者长期在环嵩山地区开展早期聚落分布时空模式及其形成机制研究肤浅心得与体会的归纳总结，内容包括对早期聚落分布时空模式研究的相关理论基础、技术方法体系粗浅见解，及在环嵩山地区开展的一系列早期聚落分布时空模式研究的案例总结。

本书由七章组成，其中第一章为早期聚落分布时空模式研究的相关理论探索，第二至六章是一系列环嵩山地区早期聚落分布时空模式研究案例，第七章为全书的相关结论以及对早期聚落分布时空模式研究未来发展趋势的研究展望。第一章绪论主要通过考古学与地学两条主线对早期聚落形态研究的发展历程进行总结，并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进行综述；第二章区域早期聚落规模—等级研究主要介绍早期聚落规模—等级的划分方法，及环嵩山地区早期聚落规模—等级空间分布形态；第三章区域早期聚落演替模式研究主要介绍环嵩山地区早期聚落传承模式研究的相关方法与研究成果；第四章区域早期聚落文化交流模式研究主要介绍利用重力模型在环嵩山地区开展早期聚落之间的相互联系及其以此形成的聚落分布时空特征与演化规律；第五章区域早期聚落分布时空模式研究主要通过相关函数对区域早期聚落的分布形态进行判别，分析区域早期聚落是否具有集聚性分布特征，以及集聚中心数量与位置，试图阐释区域早期聚落空间分布的整体特征与演化规律；第六章聚落分布时空模式形成机制研究主要通过人类文化与自然环境两个方面阐释区域早期聚落分布规律与演化特征形成的影响因素及其相互作用机制；第七章结论与展望，介绍相关研究的主要结论与学科发展的未来趋势。

本书的编著和相关研究得到河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的冯德显先生、董建国先生、阎官法先生、邱士可先生、郭仰山先生、王超先生、翟海国先生、陈盼盼先生、闫丽洁女士、郭克东先生，河南省科学技术厅的张震宇先生，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周昆叔先生、吕厚远先生，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的郭华东先生、王心源先生、洪天华先生、杨瑞霞女士，北京大学的莫多闻先生、刘耕年先生、夏正楷先生、李有利先生、张家富先生、李宜垠女士、宋豫秦先生、周力平先生、李双成先生、陈彦光先生，河南省文物局的马萧林先生、司治平先生、王瑞琴女

士，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蔡全法先生、贾连敏先生、杨树刚先生、张小虎先生，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张松林先生、顾万发先生、汪松枝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王辉先生、赵春青先生等专家学者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本书是作者多年在环嵩山地区开展早期聚落分布时空模式及其形成机制研究经历的阶段性总结与粗浅认识，希冀取得抛砖引玉的效果。水平有限，欢迎各界人士不吝指正。

鲁 鹏

2016年7月于郑州



# 目 录

前言	( i )
第一章 绪论	( 1 )
一、研究背景	( 1 )
(一) 环境考古学的两条主线	( 1 )
(二) 史前聚落地理研究的兴起	( 4 )
二、研究综述	( 7 )
(一) 国外研究进展	( 7 )
(二) 国内研究进展	( 8 )
三、研究区域概况	( 12 )
(一) 自然环境概况与特征	( 13 )
(二) 早期文化演化序列	( 16 )
(三) 早期聚落分布概况	( 18 )
四、研究内容与意义	( 20 )
(一) 研究内容	( 20 )
(二) 研究目标	( 21 )
(三) 研究意义	( 21 )
第二章 区域早期聚落规模—等级研究	( 23 )
一、引言	( 23 )
二、基于SOFM的区域早期聚落规模—等级研究	( 24 )
(一) 原理与方法	( 24 )
(二) 规模—等级划分	( 26 )
(三) 结果分析	( 31 )
三、基于SPSS聚类的区域早期聚落规模—等级研究	( 33 )
(一) SPSS聚类方法简介	( 33 )
(二) 规模—等级划分	( 34 )
(三) 结果分析	( 37 )

四、早期聚落规模—等级分布形态·····	(39)
(一) 早期聚落规模—等级划定·····	(39)
(二) 早期聚落规模—等级空间分布形态·····	(51)
(三) 区域早期聚落规模—等级模式形成机制分析·····	(60)
五、本章小结·····	(62)
<b>第三章 区域早期聚落演替模式研究·····</b>	<b>(63)</b>
一、引言·····	(63)
二、研究方法简介·····	(64)
(一) 研究思路·····	(64)
(二) 研究方法·····	(64)
三、遗址堆积形态统计分析·····	(65)
四、早期聚落演替模式研究·····	(68)
(一) 迁移型：裴李岗—仰韶演替模式·····	(69)
(二) 扩散型：仰韶—龙山演替模式·····	(69)
(三) 膨胀型：龙山—夏商演替模式·····	(69)
五、聚落演替模式形成机制分析·····	(70)
(一) 聚落演替与地形的关系·····	(70)
(二) 聚落演替与生业模式及社会形态的关系·····	(71)
(三) 聚落演替模式影响因素分析·····	(72)
六、本章小结·····	(72)
<b>第四章 区域早期聚落文化交流模式研究·····</b>	<b>(74)</b>
一、引言·····	(74)
二、研究方法·····	(75)
(一) 引力模型简介·····	(75)
(二) 研究思路·····	(76)
(三) 计算过程·····	(76)
三、区域早期聚落文化交流研究·····	(77)
(一) 区域早期聚落文化交流演化特征·····	(77)
(二) 不同流域早期聚落相互吸引对比分析·····	(78)
(三) 环嵩山地区早期聚落文化交流模式总结·····	(84)
四、环嵩山地区早期聚落文化交流模式形成机制分析·····	(85)

五、本章小结	(86)
第五章 区域早期聚落分布时空模式研究	(87)
一、引言	(87)
二、方法简介	(88)
(一) 研究思路	(88)
(二) 分析过程	(88)
三、早期聚落分布集聚性分析	(89)
(一) 早期聚落分布集聚性判释	(89)
(二) 集聚中心数量判释	(91)
(三) 早期聚落空间集聚分布特征分析	(92)
四、环嵩山地区早期聚落时空分布总体形态	(98)
五、本章小结	(101)
第六章 聚落分布时空模式形成机制研究	(102)
一、引言	(102)
二、全新世环境系统与早期聚落关系研究	(103)
(一) 全新世气候演化与早期聚落的关系	(103)
(二) 动植物资源与早期聚落的关系	(107)
(三) 河流、地貌形态与早期聚落的关系	(112)
三、文化因素与早期聚落分布关系研究	(124)
(一) 规模—等级(社会复杂化)与聚落分布的关系	(124)
(二) 生业模式与早期聚落分布的关系	(133)
四、聚落分布时空模式及其形成机制所反映的人地关系特征	(137)
五、本章小结	(138)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139)
一、主要结论	(139)
二、创新性	(140)
三、问题与展望	(140)
参考文献	(142)
后记	(157)

# 第一章 绪 论

## 一、研究背景

### (一) 环境考古学的两条主线

自1987年上宅遗址环境考古研究肇始，中国环境考古已在其拓展期发展近30年（周昆叔，1989，1991，2007；杨晓燕等，2001）。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作为交叉学科的环境考古学在其理论、方法以及实证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学科发展的历程看，支撑环境考古学不断发展的基础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以地理学、第四纪环境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和以考古学为代表的人文科学。学科背景的不同导致分别由地学与考古学主导的环境考古研究具有不尽相同的思路与模式（张萌，2012；易诗雯等，2012）。尽管自始至终非常注重多学科综合研究，但是环境考古及其相关研究仍像两根单独的线一样，时常相互缠绕，难以最终融合。

#### 1. 地学主导的环境考古学

导致地理学、第四纪环境学等自然科学研究者对环境考古产生兴趣的原因有两个。一是20世纪初叶以来，古环境研究与考古学均取得较大进展。重建古环境的科技手段迅速增加，对古代环境变化的认识水平不断提高，同时大量考古学资料迅速积累，使得早期自然环境的变化与人类文化演进相互关系的探讨更具可行性与可操作性（Trigger，1989；莫多闻等，2012；杨晓燕等，2005a，2005b）。二是20世纪末以来，世界性的环境恶化引起人们对全球变化规律的反思，人类迫切需要对造成当前生存环境恶化的原因进行探索，并对未来全球变化做出科学的预测。然而，科学的普遍规律是知古论今才能预测未来。因此，对过去的研究成为必然。过去全球变化（PAGE）成为国际学术界研究全球变化规律，预测未来全球变化三大主要计划〔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全球变化人文计划（IHD），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等的核心计划，环境考古也成为这些计划的研究焦点（朱诚，2013；田晓四等，2008；汤卓炜，2004；宋豫秦，2002a，2002b）。环境考古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三个方面：古环境复原、古人类行为重建与古人地关系研究（王辉，2005，

2010)。学科背景的限制使得地学研究者在从事环境考古研究时更侧重于古环境的恢复,而人地关系的探讨往往停留在“环境—文化”的单线联系研究模式。但是,文化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机制往往非常复杂,很多时候并非直接的相互作用过程,依靠这种单线模式对人地关系进行阐释显得过于片面和简单,使得人类活动与环境的相互影响、人类文化对自然环境的适应等研究命题难以深入。面对这一困境,迫切需要在自然环境研究与人类文化研究之间建立联系与桥梁,早期聚落独有的自然文化双重属性使之逐渐映入眼帘。作为人类活动的遗迹,聚落被深深地打上了人类文化的印记,其建筑形制、总体布局、分布格局对建造者的家庭组织、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生产方式、生业模式、技术水平等文化内涵均有所反映。同时,聚落又与自然环境密不可分,无论个别建筑还是社区布局和区域形态均明显地受到气候条件、地貌特征、水系格局等环境因素不同程度的实际限制(Trigger, 1978; 特里格, 1991, 2011)。因此,聚落研究为人类和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尖锐的焦点(张光直, 1986, 2010)。聚落研究的兴起无疑为环境考古学提出了更加明确的研究目标,使考古学与古环境学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夏正楷, 2012)。通过聚落研究,环境考古学的课题将被深化,环境考古学将摆脱将文化发展与环境演变仅仅放在大时空中做纵向比附的简单化弊病(曹兵武, 1995, 2001)。

## 2. 考古学主导的环境考古学

根据考古学思想史,考古学的发展过程大致经历了文化—历史考古学、功能—过程考古学、后过程考古学等阶段(Trigger, 1989; 特里格, 2010)。考古学家对早期环境的关注产生于文化—历史考古学向功能—过程考古学转变时期。二战后,一些考古学家越来越不满足于通过器物形态对比等方式构建早期历史年代框架的传统考古学研究思路,认为考古学的最终目的是通过考古遗存研究复原早期社会形态与人类行为,探索人类社会与精神文化的发展规律(Binford, 1962; Trigger, 1989; Tayloy, 1948; 路易斯·宾福德, 1991; 特里格, 2006)。环境被当做一种文化适应系统的重要因素纳至考古学研究范畴(Steward, 1953, 1955)。如果说以地学为基础的环境考古研究向早期聚落研究的转变经历了一个过程的话,那么考古学家主导的环境考古研究与聚落形态研究几乎同时发展,并从一开始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20世纪50年代,戈登·威利(2004; Willey, 1953)接受了斯图尔特(Steward)的建议,在秘鲁的维鲁河谷运用聚落形态的方式开展了一项田野考古研究(Trigger, 1967, 1989),并将聚落形态定义为“考古学文化功能性阐释的战略起点,因为它们反映了自然环境,建造者作用于环境的技术层次以及由文化维持的各种机构的社会互动和控制”(Willey,

1953, 1956, 1981; 戈登·威利, 2007; 特里格, 2011)。至此, 聚落形态研究与环境考古研究紧密结合, 并对此后的考古学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Binford et al, 1983; Chang, 1968)。尽管由于功能—过程考古学充斥着极端的乐观而受到强烈的批评, 并受到包括后过程主义考古学在内的许多其他观点的挑战, 但聚落考古已经成为各个考古学派广为接受的基本方法 (Renfrew et al, 2005; 科林·伦福儒等, 2004, 2012; 米歇尔·福柯, 2012)。

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生与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到五四运动前后历史学领域展开的古史辨运动的强烈影响。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运用西方近代史籍考证法对中国上古史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并希望建立具有科学依据和信服力的新的上古史 (陈星灿, 1997)。但是, 对上古史的重建需要从实物上寻找证据, 这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 重建上古史也成为中国考古学此后很长时间里的主要任务, 而文化—历史观也成为中国考古学发展的主导思想。1984年, 张光直先生应邀在北京大学考古系进行系列演讲, 对国外先进的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等进行了系统的讲解与介绍 (张光直, 1986)。在张光直先生等的推动下, 中国考古学积极吸取国外考古学的先进思想与方法, 环境考古、聚落形态等也得到了国内考古学家更多的关注 (栾丰实等, 2002; 陈淳, 2004; 严文明, 1997a; 张光直, 2002a, 2002b, 2013; 苏秉琦, 1999, 2009; 俞伟超, 1996)。一方面, 许多考古遗址的发掘过程积极引进自然科学研究学者参加, 考古学家也常常采集孢粉、植物硅酸体等样品进行实验分析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 2002;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2007;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等, 2008)。另一方面, 田野考古工作十分注重聚落形态信息的收集与整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 2010)。但总体来说, 在传统的文化—历史观念的影响下, 环境考古工作更多的是为考古遗存提供一定的环境背景, 或者以重建早期环境史为直接目的, 而聚落形态更多的成为一种田野考古的操作方式, 用以指导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不仅有关人类行为及其影响机制的相关研究与探讨较为少见, 而且环境考古与聚落形态研究并未得到有机而又紧密的相互结合。自20世纪末, 随着考古学的深入发展, 各个区域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与年代框架纷纷建立 (苏秉琦, 1994)。在此背景下, 考古学家的注意力也从史前史的重建逐渐向社会复杂化等具体的人类社会学问题转变。而粗线条的、适应文化史构建的考古学文化 (类型) 已难以成为细密的社会考古研究的解码, 作为人类早期基本生产生活单元的聚落成为社会考古学的最佳切入点, 一种可称为“聚落本位”的社会考古学研究方法呼之欲出, 与此相关的精细

化背景关系研究也成为必然<sup>①</sup>。

由上述学科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 尽管环境考古经历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 但所谓殊途同归, 分别沿两条主线各自发展的环境考古学最终均聚焦于早期聚落研究。通过早期聚落研究, 主导环境考古学发展的两大基础紧密结合, 共同推动环境考古学不断地向前发展。

## (二) 史前聚落地理研究的兴起

“聚落”一词出自人文地理学, 按照德文siedelung的字意为居住地。李希霍芬(Richthofen)曾指出, “人类定着于地表, 并占领地表, 其中一种占领样式即为聚落”(张文奎, 1993)。英国地理学家海德(Peter Haggett, 1979)将聚落定义为“人类占据地表的一种具体表现, 是形成地形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聚落地理学一般包括城市聚落地理学与乡村聚落地理学。其中城市聚落地理学主要研究城市区位与环境的关系、城市与环境、城市地域结构发展动力与模式、城市景观与感知等(王恩涌等, 2000)。乡村聚落地理学则主要研究聚落与环境的关系、乡村聚落规模与布局、乡村聚落体系、城镇化、乡村聚落类型等(金其铭, 1984, 1988)。现代聚落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主要为定性描述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式, 尤其是二战以来定量分析在相关研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并以此推动了一大批具有相对影响力的成果。除已被奉为经典的中心地理论外(克里斯特勒, 1933), 奥尔巴哈(F. Auerbach)与济普夫(G. K. Zipf)的等级规模法则(Rank-size Rule)以及用以分析聚落散落/集聚特征的勒芒戎(A. Demangeon)公式、索尔(M. Sorre)公式、道布里公式、石原润公式等也对聚落地理学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石原润等, 1984)。可以看出, 尽管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对现代聚落地理研究提出了一定的现实需求, 使得现代聚落地理研究具有为城市规划、村镇规划等工作提供参考与依据的实际目的。但更重要的是, 现代聚落地理始终着重于以人地关系理论为基础的地球表面人类活动与环境的相互关系所形成的现象分布与变化研究, 并尝试探寻一种协调、和谐的人地关系理念与价值观(李旭旦, 1985)。

地理学具有重视过去研究的传统(Baker, 1972; Williams, 2003)。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Mackinder, 1902)主张地理学应试图重建过去的地理, 并显示变化的过程如何形成今日可以观察到的地表特征。否则, 地理学就只是对当代特征的描述。

<sup>①</sup> 许宏:《二里头文化命名的学术史思考》, 嵩山与夏文明——纪念登封玉村首次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存60周年研讨会, 2013年9月25日, 郑州。

加入时间维度,才能研究变化的过程,并显示当前的地理只不过是一系列变化的最新阶段。哈特肖恩(Hartshorne, 1979)甚至认为,对于不断变化的统一体的历史研究本质上是地理学的,而不是历史学的。因为地理学的注意力在于研究不断变化过程中的区域特征,而历史学的兴趣则在于过程本身。正是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聚落地理研究也不可避免的延伸至历史时期。这种研究思路与研究趋势在历史资料极其丰富的中国表现得尤为显著。正是基于这些海量的历史文献,一大批历史聚落地理的成果相继问世(王晓伟等, 2012)。其中有代表性的如侯仁之先生的《天津聚落之起源》(1945),陈桥驿先生的《历史时期绍兴地区聚落的形成与发展》(1980)等。同现代聚落地理类似,历史聚落地理也着重于聚落的形成、发展、空间分布、聚落形制、内部结构等及其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研究。但研究方式上更侧重对历史文献的解读与诠释,这在早期的历史聚落地理研究表现得尤为明显。同时,历史聚落地理仍强调以人地关系思想作为学科发展的理论基础,并从动态、演化的角度给予人地关系理论新的诠释。

聚落的理念被引入考古学后,在继承其地理学特征的同时,更融入了大量考古学科特有的内涵(曹兵武, 1995; 陈淳, 1997, 1999; 刘辉, 2000; 严文明, 1997b; 华锋林, 2009; 王建华, 2003; 魏峻, 1998)。张光直(1991)将聚落定义为一种处于稳定状态,具有一定地域并延续一定时间的史前文化单位。严文明(1997c)、张忠培(1999)则认为其是以聚落为单位的一种考古学研究方式。总体来说,考古学中的聚落形态基本具备两种功能。第一,其类似一种操作规则或作业规范,用以指导调查、发掘、材料收集、组织与解释等考古学各项工作。第二,其将社会学的一些理念引入考古学,通过聚落形态及其背景关系研究,探究早期社会组织、人类行为、政治体系、生产方式等社会文化要素的特征与构成,并试图在一定程度上对早期社会进行重建与复原。尽管考古学中的聚落形态具有强烈的社会学理念与思想,但聚落极具明显的时空特征以及与自然环境紧密的相互关系使得聚落考古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与地理学产生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地理学的一些理论,尤其是人地关系理论常常被引入聚落考古研究,用以对考古资料的解析与阐释。同时,地理学的一些方法、技术等也被引入聚落考古,空间信息技术、计量分析、实验测试等在聚落考古资料数据获取、管理、分析、可视化以及背景研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甚至中心地理论、规模—等级法则等地理学经典模式也被引入(张海, 2004; 刘莉, 2002, 2007),用以验证其在史前时期的适用性与合理性或试图对聚落形态和社会复杂性等问题进行解释。

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发展与考古资料的积累,聚落地理研究逐渐具备延伸至史前时



期的条件，史前聚落地理研究也随之兴起（王妙发，1999；高蒙河，2005；鲁鹏，2013a）。地理学所关注的是地理实体分布的时空规则以及形成这种规则的内在机制，因此史前聚落地理基本沿袭了现代聚落地理与历史聚落地理的研究思路，重点考察史前聚落的时空分布规律及其形成这种规律的影响因素，探索人地互动的相互作用关系。这与聚落考古试图通过聚落形态复原早期人类行为与社会形态的社会考古学研究思路略有不同。同现代聚落地理与历史聚落地理相比，史前聚落地理的研究对象，聚落形态与环境特征既非直观的存在于现实空间，也没有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可循，因此研究方式与现代聚落地理和历史聚落地理有很大的不同。史前聚落地理研究中，聚落形态数据主要来自于考古学，而环境演化数据则必须依靠于第四纪环境学，因此，史前聚落地理更具交叉学科的基本特征。但与现代聚落地理与历史聚落地理相同的是，人地关系理论仍是史前聚落地理研究发展所依托的基本理论，而且随着史前聚落地理的发展，人地关系研究的时空维度也得以扩展，其随之被延伸至遥远的史前时期。

综上，尽管史前聚落研究具有明显的交叉学科特征（图1-1），但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始终同地理学保持无法割舍的联系。地理学在从事史前聚落研究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具备得天独厚的学科背景优势。以此催生的史前聚落地理研究不仅保留有传统地理学的研究理念，更具备将现代地理学先进的研究方法与技术手段引入的便利条件。因此，史前聚落地理研究的兴起不仅符合学科发展的总体趋势，而且具备成熟的先决条件。史前聚落地理的兴起和发展，势必将推动环境考古学、聚落地理学、聚落考古学等相关学科的不断进步与快速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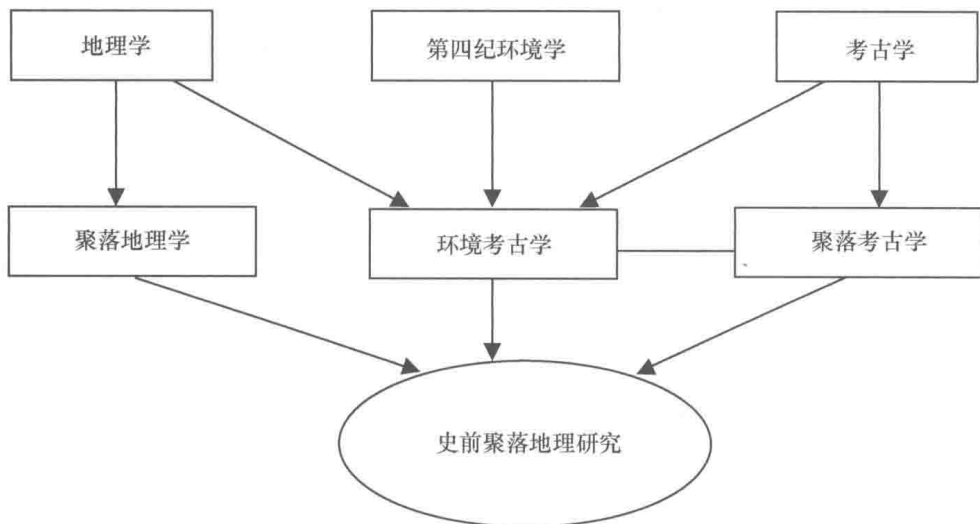


图1-1 史前聚落地理研究与相关学科的关系